

歷史與現場，記憶與創造

The Memory and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Sites

——編輯室報告

2016年文化部提出了「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將文化資產保存視為「重大公共投資」，企圖以文化形塑集體記憶，凝聚國民向心力和光榮感，並向國際展現臺灣的「軟實力」。根據行政院新聞網重要政策的說明：文化部2017年將此計畫納入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 城鄉建設 - 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至2025年預計將投入100億元；至2021年11月止，該計畫已投入約73億元，共補助22縣市41個不同的計畫案。這些計畫案包括：新北市的清法戰爭案、臺北市的療浴北投、新竹市的六燃廠與眷村、南投縣的Sbayan泰雅民族起源、高雄市的左營見城與興濱計畫、連江縣的戰地轉身與冷戰島嶼，以及屏東縣的牡丹社事件與排灣舊社重現等等。在過去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與修復活用的基礎上，行政院強調，這些計畫更重視「人民與土地、歷史記憶的重要性」，並且「擴大到區域性的文化資產保存，進而以文化治理帶動城鄉發展，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中」。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文標題與中文標題的語義落差，「再造」意味著重新模塑，而regeneration則有「再生」和「再次活化」使用的意味。如果說再造暗含著國家意識形態的重新包裝和賦義，那麼再生與再次活化則更貼近了文化部與地方期待歷史現場再利用，以「創意文化」帶動經濟發展的現實期待。

這確實是一個相當宏大的計畫，以文化和歷史為軸線，重新串連過去與當下，地區與歷史，以凝聚集體記憶與國民認同，同時也藉由公共政策的挹注予以地方經濟與歷史發展的活水和泉源。由各縣市提出的計畫來看，我們不難看見，歷史現場的再造也是歷史記憶的重述，它同時也是文化、歷史和生活的重新扣連，從地方出發重建國家歷史與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歷史與生活都不只是中性的表述，而是內涵著國家意識型態的文化工程，也因此文化資產的保存關涉的不只是地方如何活用的問題，更涉及了如何講述地方歷史，投射家國想像的挑戰。不論是泰雅民族起源，牡丹社事件或是清法戰爭與金門的冷戰島嶼，我們不難發現各自敘述的糾結矛盾，往往難以調合，歷史與現場的關係並非不言自明，記憶的回復往往亦是創造。文化重建的工程如何重新詮釋歷史，既與當下調和，又不違背和抑制多重的記憶，其所面對的挑戰顯然更勝於國家經費的挹注與民間經濟的振興。

1 見行政院。2021/12/13。〈重要政策：再造歷史現場〉。Retrieved from: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90f0af5e-5a83-48ad-8012-12c90619ec4b>。文化部則強調「透過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整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計畫，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見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簡介〉。Retrieved from: <https://rhs.boch.gov.tw/index.php?inter=about&id=1>）。

由本刊編委陳瑞樺規劃和推動，於本期推出的「再造歷史現場」專題就是面對這些挑戰的一次嘗試。專題中的四篇文章（另有三篇待下期推出），分別從都市社會運動對文化與地產治理的挑戰和協商（顏亮一、張耕蓉），以及從常民保存、藝術展演、與地景記憶（許澗文、賴雯淑和劉柳書琴）等角度著手，思考歷史現場如何再造，文化記憶如何保存（進一步討論，請見陳瑞樺的「專題導言」）。從實踐的位置上出發，這些論文一方面接受了「再造歷史現場」的時代意義，另一方面也質疑著歷史、空間與治理的關係，探討保存、修復與活用的辨證，以及歷史、記憶與所謂「現場」之間的曖昧與緊張。〈「前鎮草衙」再造地方認同的實作〉這篇座談記錄，則將專題的關懷延伸到高雄的都會鐵鏽區，提醒我們文化實作如何嘗試改變地方認同與生活，從而開創新的共同體。座談納入了大學與社區合作的考慮，從價值生產與創造的角度重新追問「地方」與勞動的意義，並提醒我們，文化與歷史並不僅僅是繼承而來，亦是在一步一步的具體實踐中開花結果；它雖然也仰賴官方政策的協助，但更有賴在地住民的自我認同與實踐，才能將記憶融入在地生活的肌理之中，進而成爲未來歷史的一部分。這樣的地方史視角或許有助於調整由上而下預設出來的國家觀點，更能深化「再造」、「歷史」與「現場」三者間的多重連繫與緊張關係。

本期收錄的一般論文，雖然與「再造歷史現場」專題沒有直接關係，卻可以在思考的延伸中看到「現場」之於歷史和經驗的複雜性。江凱斌的論文討論的雖然是「文本旅遊」與「聖地巡禮」這兩個來自於日本，關乎觀光研究的概念，但是不論是「文本旅遊」或是「聖地巡禮」都具有歷史的內涵；在所謂的深度旅遊的脈絡中，文本再造著現場，而現場（聖地）也改變了旅遊的意義，一如在「再造歷史現場」的脈絡中，歷史敘述決定著現場的意義，而現場的再造、位移和再使用也改變了記憶的形貌。同樣的，鄭琪的文章討論的雖然是作爲另類媒體的連儂牆，她對跨域串聯與政治動員的討論同樣賦予了連儂牆一種強烈的現場感和歷史感，乃至引發了關鍵的連儂牆保存問題。同時，連儂牆所投射的民主牆想像，也賦予了這一面面臨時搭建，改造原來空間使用的另類媒體，一種在地性，即令其本質本應是跨域的，而圍繞著連儂牆而出現的諸多衝突，包括拆毀與保存，就可能成爲地方記憶，代代傳承。雖然鄭琪分析的主軸不是歷史現場，但連儂牆具有的歷史現場的意義，反而強化了歷史與現場的思辨，深化了「創造」與「再造」之間的多重與跨域辨證，也讓我們體會到歷史的無所不在與毫無所依。

陳俊啟與呂正惠的兩篇書評亦是本期不可錯過的亮點。本刊編委黃文倩於2021年9月推動了一場關於《哈佛新編中國文學史》的討論，邀請了不同世代的學者對王德威老師爲哈佛大學出版社新編的這本文學史進行對話。這兩篇書評原是討論會上的發言：陳俊啟從文學史書寫的角度討論《新編》的特色與侷限，呂正惠則從中國文學史的議題切入，質問衆聲喧「華」的意義與遺忘。雖然兩位學者未必完全同意《新編》的企圖，但他們火花四射的評論足以彰顯《新編》爲文學史與當代中國研究帶來的挑戰，值得讀者思考與跟進。

